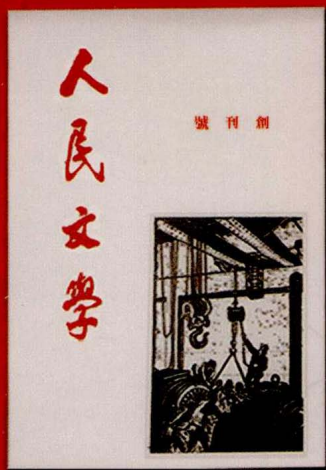


李红强 /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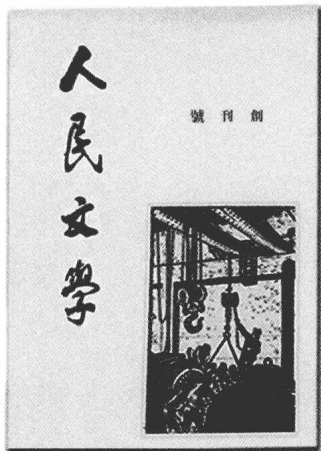
# 《人民文学》十七年

1949—1966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李红强 / 著



《人民文学》十七年  
1949—1966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民文学》十七年/李红强著.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9.10

ISBN 978-7-80170-800-7

I. 人… II. 李… III. 《人民文学》—史料 IV. I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60618 号

出版人 周五一  
策划编辑 乔平  
责任编辑 乔平  
责任校对 郭雪  
封面设计 耀午书装  
出版发行 当代中国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  
网 址 <http://www.ddzg.net> 邮箱: [ddzgcbcs@sina.com](mailto:ddzgcbcs@sina.com)  
邮政编码 100009  
编辑部 (010)66572152 66572264 66572154  
市场部 (010)66572281 或 66572155/56/57/58/59 转  
印 刷 北京润田金辉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1020 毫米 1/16  
印 张 13.5 印张 插图 97 幅 153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拨打(010)66572159 转出版部

## 目 录

### 第一章 生而权威 1

#### 一、新中国文艺的方向\_\_\_\_\_ 2

- 《人民文学》的起点 2
- 题词者、主编和登记人 5
- 三位一体的主编们 10

#### 二、期刊群体之间的等级性秩序\_\_\_\_\_ 18

- 新中国的期刊体制链 18
- 在中央级报刊之间 22
- 为地方级期刊树立标准 33

#### 三、“象征效应”为核心的传播发行\_\_\_\_\_ 40

- 剔除商业因素 40
- 沈从文的复活 44
- 文学新人的突变 49

## 第二章 《人民文学》的内部生产机制 53

### 一、编辑群体的选择\_\_\_\_\_ 54

- 主编的六次更迭 54
- 编辑的三次大换血 59

### 二、编委胡风\_\_\_\_\_ 65

- 一封退稿信 65
- 《三十万言书》中的全盘计划 68
- 身陷八卦阵 70
- 《睡了的村庄这样说》 76

### 三、体现规划要求的组稿与审稿\_\_\_\_\_ 81

- 大规划与大拼盘 81
- 审稿机制的六次微变 85

### 四、选择作家与作家姿态\_\_\_\_\_ 93

- 头题小说 177 篇, 107 人 93
- “指导者”: 茅盾和丁玲 96
- “人民的本色”: 巴金、冰心、老舍、艾芜 98
- “问题”作家赵树理 102
- 新生力量的主流化 104

## 第三章 《人民文学》“异端”文学的生成 109

### 一、《人民文学》“异端”文学的四条脉络\_\_\_\_\_ 110

- 《除夕》与写“真实” 110
- 方纪与“人性”书写 114
- 《回答》《望星空》与自省 118

■ 《羊舍一夕》与风格叙事	123
二、《我们夫妇之间》引发的争论	127
■ 不经意的发表	127
■ 萧也牧的创作转折	130
■ 小说改编和占据了“市场势力”	132
■ 新文学在城市的生存权之争	137
三、秦兆阳与“干预文学”的生成	143
■ 有限度的“思想纲领”	143
■ 《人民文学改进计划》的三个文本	150
■ 不断摇摆的版面安排	160
■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修改之争	165
<b>第四章 “双百”时期的论坛——“短论”和“创作谈”</b>	<b>169</b>
一、栏目与专题	170
二、从呼唤“先进”到规范“鸣放”	174
三、对文学生产机制的整体批评	180
四、一次文学传统的回归	186
<b>附录：新时期的《人民文学》</b>	<b>191</b>
一、王者归来	192
二、文学资源分割与权威下降	196
三、我们的生活、经验和灵魂	201
<b>后 记</b>	<b>206</b>
<b>参考书目</b>	<b>208</b>

## 第一章 生而权威



# 一、新中国文艺的方向

1949年，新中国宣告成立，历史从此进入了一个翻天覆地的新时期。在恢宏的历史巨变面前，种种伟大的事件为全世界所瞩目。与之相比，一家文学刊物的创办实在算不上大事件。即便是在期刊这一单线条的历史上，晚清以来的期刊也多如过江之鲫。如《新青年》《东方杂志》《小说月报》《创造》《七月》等那样名震当世的期刊，也不在少数。但依靠后人追溯、“再造”的历史，并非真实完整的历史现场。同样，凭借实践与时间自然积累形成的权威，也并非生而高贵。创办在1949年这一伟大历史时刻的《人民文学》杂志，则改变了寻常的逻辑。这家文学期刊的“主体”身份构造过程，出现了与此前创办的文学期刊完全不同的经验模式。此前的期刊创办模式，有《新青年》与《创造》社的同人性质，《小说月报》的社会组织型社团模式，亦有《抗战文艺》政府许可下的统战性质，《解放日报·文艺》1942年改版时政党领袖亲自参与、设定的党刊性质。<sup>①</sup>《人民文学》杂志，则依托以党组织为核心的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简称“全国文联”）、新中国的文学体制，以及三位一体的主编们等因素，生而权威。

## ■ 《人民文学》的起点

1949年8月4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发表了一则消息：《全国文联出版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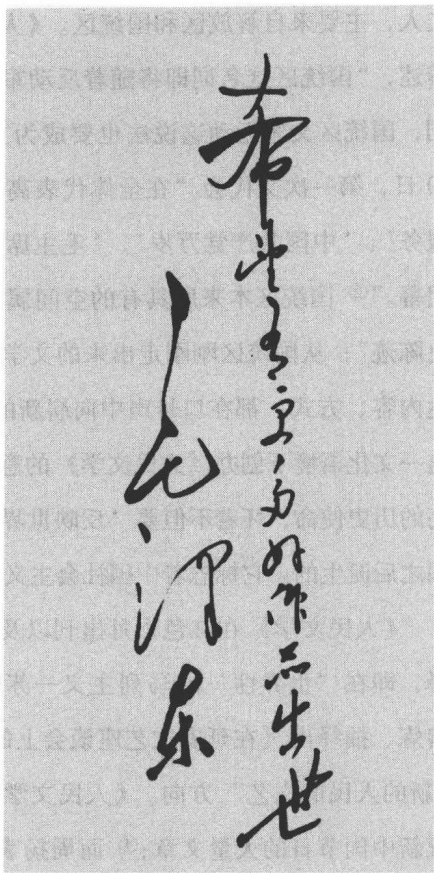
<sup>①</sup> 参见艾克恩：《延安文艺运动纪盛》，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



“人民文学”》，称全国文协决定出版月刊一种，茅盾、欧阳山、冯雪峰、艾青、何其芳分任编辑委员，茅盾任主任委员，“现正积极筹备中，闻十月一日即可与读者见面”。这则消息还说，《人民文学》的地址已经确定。事实上，《人民文学》正式出版的时间为10月25日。之所以推迟出版时间，可能在于“积极筹备”得不是太充分。但一个重要的信息非常鲜明，《人民文学》最期望的出版日期是“10月1日”。

新中国宣告成立的时间正在10月1日。时间上的重合，用经验型的判断则简单明了，全国文协试图创办第一份全国性的文学杂志以向新中国成立献礼。按照吉登斯的说法，时间与空间在无产阶级文化体系中则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统一时间是控制空间的基础”。<sup>①</sup>以此来看，这一时间的重合，是文学与政治两个空间的并置，或者说是后者对前者的“控制”。“红色十月”成为“无产阶级文化”上升到主流地位的象征，而且是由足够的现实统治权力作为保证的象征。《人民文学》对这一时间的选定，将自己纳入这一意识形态化的象征性时间，其文化的同一性选择不言而喻。

这一时间的选择，还象征着一种崭新的历史文化取向与之前文化传统的“断裂”。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简称“文代会”）汇聚的



1949年，毛泽东同志为《人民文学》创刊号题词：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

<sup>①</sup>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2000年7月版，第16页。

文人，主要来自解放区和国统区。《人民日报》对茅盾的文代会报告进行重点转述，“国统区这名词即将随着反动军事力量的全部彻底消灭而成为历史的名词，国统区文艺运动这说法也要成为文艺运动史上的陈迹了”。<sup>①</sup> 1949年7月20日，第一次文代会“在全体代表高呼‘全国文艺工作者团结起来为工农兵服务’、‘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和雄壮的奏乐声中胜利闭幕。”<sup>②</sup> 国统区本来所具有的空间属性及其文化形态，此时已被断定为“历史陈迹”；从国统区刚刚走出来的文学界人士，以及他们所习惯操持的文学表达内容、方式，都在口号声中向崭新的工农兵文学转移。骆宾基后来说出了在这一文化语境下创办《人民文学》的意图：“《人民文学》是一开始就肩负着崇高的历史使命，怀着不但要‘反映世界’且要‘改变世界’的雄心于1949年建国之后诞生的。它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划时代的开始。”<sup>③</sup>

《人民文学》在红色十月出刊以及所刊文章，展示出新中国话语的文化选择，即在“世界性”的马列主义—苏联文化和“民族性”的毛泽东思想中，熔炼、抽绎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所代表的“新的人民的文艺”方向。《人民文学》创刊号上并置了将苏联奉为导师与庆祝新中国节日的大量文章；<sup>④</sup> 而周扬表达新中国话语对文学进行具体“规约”的报告，则以最醒目的专论形式在创刊号上出现。他以类似毛泽东宣告新中国成立的气势宣布：“毛主席的《文艺座谈会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sup>⑤</sup>

“红色十月”中发生的另一个民族性文学事件，则是对鲁迅逝世的纪念。

---

① 柏生：《全国文代会第三日：茅盾报告十年来国民党统治区的革命文艺运动》，《人民日报》1949年7月5日第2版。

② 柏生：《文代会胜利闭幕 全国文联宣告成立》，《人民日报》1949年7月20日第1版。

③ 《人民文学创刊40周年纪念》，1989年《人民文学》内部刊物。

④ 如“社论”栏目下的文章：《震动世界的十日》《中苏团结，保卫世界和平！》《欢迎苏联代表团，加强中苏文化的交流》。设有“苏联文学”的专题，其中有周立波的文章《我们珍爱苏联的文学》。歌颂节日的诗歌有：何其芳《我们最伟大的节日》，柯仲平《我们的快马》，李霁野《在“七一”庆祝大会上》。

⑤ 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见《人民文学》1949年创刊号。这篇文章是周扬在第一次文代会上的发言，代表的是中共中央对文艺的意见。

1949年10月是鲁迅逝世13周年。鲁迅以及五四文学传统，无可避免地出现在这一象征性的时间。被纳入新中国的叙事话语，成为鲁迅的命运。但是，新中国话语从政治文化上对鲁迅的阐释，并不能完全遮蔽鲁迅所隐喻的五四文学传统，也无法完全抹去新中国话语系统中茅盾、胡风、丁玲等人的真实体验和个人性的历史记忆。对鲁迅的纪念成为《人民文学》创刊号上的一个专题。胡风的《鲁迅还在活着》，以对“精神奴役”在新中国话语中依然存在的警示，显示出了与毛泽东、周扬等对鲁迅所做的主流界说的歧异。五四传统、毛泽东的文艺方向、苏联文艺模式，在象征性的“红色十月”并置于《人民文学》的创刊号上，构成了《人民文学》的起点。

### ■ 题词者、主编和登记人

在象征性时间中诞生，并成为象征性时间所包含的文化体系一部分的《人民文学》，从新政权所选择的文化体系中获得了充足的权力资本。最为显性的事件是最高领袖对《人民文学》的关注。毛泽东本人应《人民文学》第一任主编茅盾的“请示”，为《人民文学》题词：“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茅盾还邀请毛泽东题写刊名。毛泽东转而邀请文联主席郭沫若题写。在十月这一象征性时间内，郭沫若题写刊名这一事件，似乎隐喻着文学赢得权力资本的另一种更为隐蔽性的方式，或者说它是新中国的政权力量抵达



《人民文学》1949年10月创刊时，郭沫若题写的刊名。

文学对象所采用的转换方式。在鲁迅去世之后，郭沫若就被中共中央以内部决议的方式塑造为文化界的领袖，是共产党在文化战线上具象化的、最高的

形态。<sup>①</sup> 题写刊名事件中的郭沫若，其实可理解为政权力量以隐蔽的“转换方式”渗透文学、在赐予文学以权力资本时对文学进行“规约”所采纳的一种华丽形式。当然，《人民文学》也由此在主动的“共谋”意愿与姿态中获得了显赫的权力资本。《人民文学》这一做法为其他文艺刊物的安身立命塑造了一种通用的模式，接连创办的重要文学刊物，大都模仿《人民文学》由领袖题词。

权力抵达《人民文学》的方式，不只简单地流于象征，主要还表现在《人民文学》实际的组织秩序中。

首先是最高权力对主编的任命制。《人民文学》是新中国政权组织下的产物，是新政权在艺术界的最高机构——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sup>②</sup>——所设置的机关刊物或者文艺阵地。文协也非如其自我界定的那样，是文学工作者志愿结合的群众性组织。它最多可称为半官方组织。在第一次文代会筹备期间，小范围的党组织会议一直在筹备会间隙举行，掌控着筹备会的方向和进程。<sup>③</sup> 1949年7月3日开始的第一次文代会上，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党的领袖曾先后到场，对即将进入新中国话语系统的文学艺术工作者表示肯定。文协实际上履行着在统一意志下将不同主张、党派、来自不同空间（解放区/国统区）的文学工作者组织起来的功能，中共中央直接领导的党组才是文协的实质领导者。<sup>④</sup>

作为文协机关刊物的《人民文学》，也自然被纳入到了党领导下的组织秩序和程序之中。茅盾、艾青成为《人民文学》的正副主编，须经过文协全国委员会选举和党组批准的程序。这样，主编与《人民文学》之间的关系，首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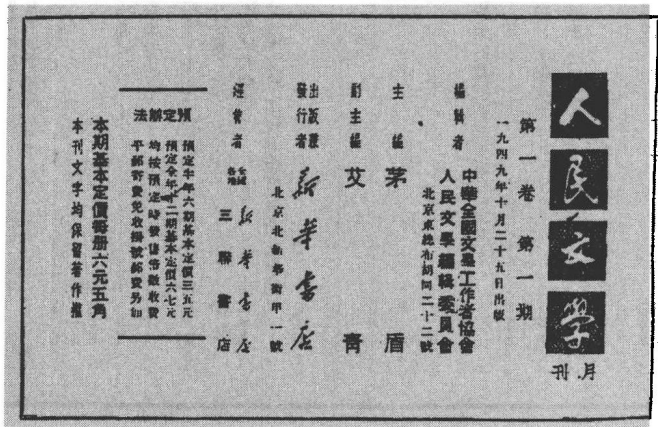
① 1938年夏，中共中央根据周恩来建议，作出党内决定：以郭沫若同志为鲁迅的继承者和中国文化界的领袖，并由全国各地党组织向党内外传达，以奠定郭沫若同志文化界领袖的地位。1941年，《新华日报》与延安《解放日报》相呼应，为郭沫若做寿。见艾克恩：《延安文艺运动纪盛》，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293~294页。

② 1953年第二次文代会上改名为中国作家协会。在叙述1953年之前的事情时，本文称“文协”；之后则称“作协”。

③ 《文代会日记》，《阿英文集》，三联书店，1981年版。在《文代会日记》中，文代会筹备会主任是茅盾；但周扬等召集的党组织会议，在筹备会大会间隙时常举行。见《文代会日记》中1949年6月14日，6月24日，6月30日，7月6日，7月17日等记载。

④ 1979年张光年曾说起此前选举制度的惯例，“上边先提候选人名单，党内保证，然后大家画圈……”见《张光年文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24页。

先是一种权力主体与权力客体的关系，其次才是主编与刊物之间的业务或者精神联系。至于如《新青年》那种主编与刊物之间声息相应的、个人性的精神联系，只能任凭编辑个人的具体情况而体现出不同。茅盾之后，邵荃麟、严文



《人民文学》创刊号封三登载了主编、副主编的名字。

井、张天翼等也是历经同样的程序先后成为《人民文学》的主编的。同样，这一职位所赋予他们的权力性也是先于他们作为编辑的个人性。被党组织赋予权力的主编以及主编所拥有的《人民文学》，则需要新的意识形态的规范下行使自己的文学实践。茅盾在《人民文学》发刊词中，先后两次强调：“作为全国文协的机关刊物，本刊的编辑方针当然是要遵循全国文协章程中所规定的我们的集团的任务。”借助主编的任命程序以及文协机关刊物的背景，《人民文学》由此享有显赫的权威。

其次是保持纯洁的“排他制”。1948年临时成立的出版工作委员会是负责接收北平乃至全国出版业的最高权力机构。在中共华北局宣传部部长周扬领导下，出版工作委员会发布指示，清查各类期刊、图书，要求实行严格的登记制。私营出版业逐步被取消。不仅“几乎没有一个”40年代的“重要刊物延续到1949年之后”，<sup>①</sup>包括1950年前后在北平、上海等地由共产党人创办的期

<sup>①</sup> 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06页。

目 錄		一九四九年十月號	
發刊詞	茅盾(一三)	紀念魯迅三十週年	魯迅先生
【慶祝世界十月日】	二五	憶魯迅先生	魯迅還在活着
中蘇團結，保衛世界和平	二五	中國小說史家的魯迅	魯迅創作的獨立特色和他受俄羅斯文學的影響
歡迎蘇聯代表團，加強中蘇文化的交流	二五	我們最偉大的節日	在「七一」慶祝大會上
新的人民的文藝	周揚(二)	我們最偉大的節日	何其芳(二〇)
我們的快馬	柯仲平(二七)	在「七一」慶祝大會上	李魯野(七〇)
火光在前	劉白羽(四〇)	魯迅先生	巴金(五三)
買牛記	康濯(四七)	魯迅還在活着	胡風(六〇)
村仇	馬烽(五七)	中國小說史家的魯迅	鄭振鐸(五〇)
在藝術和文學中高舉起蘇維埃愛國主義底	陳展章(六三)	魯迅創作的獨立特色和他受俄羅斯文學的影響	馮雲華(一〇〇)
旗幟(柯浩文資料)	周立波(七〇)		
我們珍愛蘇聯的文學(柯浩文)	陳(四〇七)		
孔厥創作的道路(尹白)	李(四一七)		
畫頁：			
毛主席接見青年	徐特立(四七)		
毛主席接見青年	(八)		
毛主席接見青年	(九)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全國文聯代表團	(一〇)		
魯迅先生遺像	(一一)		
魯迅先生遺像	(一二)		
魯迅先生遺像	(一三)		
魯迅先生遺像	(一四)		
魯迅先生遺像	(一五)		
魯迅先生遺像	(一六)		
魯迅先生遺像	(一七)		
魯迅先生遺像	(一八)		
魯迅先生遺像	(一九)		
魯迅先生遺像	(二〇)		
魯迅先生遺像	(二一)		
魯迅先生遺像	(二二)		
魯迅先生遺像	(二三)		
魯迅先生遺像	(二四)		
魯迅先生遺像	(二五)		
魯迅先生遺像	(二六)		
魯迅先生遺像	(二七)		
魯迅先生遺像	(二八)		
魯迅先生遺像	(二九)		
魯迅先生遺像	(三〇)		
魯迅先生遺像	(三一)		
魯迅先生遺像	(三二)		
魯迅先生遺像	(三三)		
魯迅先生遺像	(三四)		
魯迅先生遺像	(三五)		
魯迅先生遺像	(三六)		
魯迅先生遺像	(三七)		
魯迅先生遺像	(三八)		
魯迅先生遺像	(三九)		
魯迅先生遺像	(四〇)		
魯迅先生遺像	(四一)		
魯迅先生遺像	(四二)		
魯迅先生遺像	(四三)		
魯迅先生遺像	(四四)		
魯迅先生遺像	(四五)		
魯迅先生遺像	(四六)		
魯迅先生遺像	(四七)		
魯迅先生遺像	(四八)		
魯迅先生遺像	(四九)		
魯迅先生遺像	(五〇)		
魯迅先生遺像	(五一)		
魯迅先生遺像	(五二)		
魯迅先生遺像	(五三)		
魯迅先生遺像	(五四)		
魯迅先生遺像	(五五)		
魯迅先生遺像	(五六)		
魯迅先生遺像	(五七)		
魯迅先生遺像	(五八)		
魯迅先生遺像	(五九)		
魯迅先生遺像	(六〇)		
魯迅先生遺像	(六一)		
魯迅先生遺像	(六二)		
魯迅先生遺像	(六三)		
魯迅先生遺像	(六四)		
魯迅先生遺像	(六五)		
魯迅先生遺像	(六六)		
魯迅先生遺像	(六七)		
魯迅先生遺像	(六八)		
魯迅先生遺像	(六九)		
魯迅先生遺像	(七〇)		
魯迅先生遺像	(七一)		
魯迅先生遺像	(七二)		
魯迅先生遺像	(七三)		
魯迅先生遺像	(七四)		
魯迅先生遺像	(七五)		
魯迅先生遺像	(七六)		
魯迅先生遺像	(七七)		
魯迅先生遺像	(七八)		
魯迅先生遺像	(七九)		
魯迅先生遺像	(八〇)		
魯迅先生遺像	(八一)		
魯迅先生遺像	(八二)		
魯迅先生遺像	(八三)		
魯迅先生遺像	(八四)		
魯迅先生遺像	(八五)		
魯迅先生遺像	(八六)		
魯迅先生遺像	(八七)		
魯迅先生遺像	(八八)		
魯迅先生遺像	(八九)		
魯迅先生遺像	(九〇)		
魯迅先生遺像	(九一)		
魯迅先生遺像	(九二)		
魯迅先生遺像	(九三)		
魯迅先生遺像	(九四)		
魯迅先生遺像	(九五)		
魯迅先生遺像	(九六)		
魯迅先生遺像	(九七)		
魯迅先生遺像	(九八)		
魯迅先生遺像	(九九)		
魯迅先生遺像	(一〇〇)		

《人民文学》创刊号刊登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纪念鲁迅、向苏联学习的文章以及反映战争和农村题材的小说。这些既是《人民文学》此后的办刊方向和选择文章类别的样本，又成了新中国文学此后几十年总体构成的缩影。

刊，也先后实行重新登记，继而被停刊。<sup>①</sup> 1948年出版工作委员会决定出版的只有9种期刊，文艺方面的只是《文艺报》和《人民文学》。随着全国文代会的召开，文艺方面的期刊按照专业化原则统一由全国文协的各协会来主办。在这些刊物中，《人民文学》是唯一专门发表文学作品的刊物。

再就是《人民文学》所依托的垄断发行体制。《人民文学》创刊之初，即被纳入政权组织秩序。《人民文学》创办时的登记人，既不是主编茅盾，也不是文协中人，而是时任出版工作委员会委员、分管出版工作的黄洛峰。<sup>②</sup> 在出

① 如严辰、吕剑在到《人民文学》之前曾创办《文艺劳动》，沙鸥曾办有《大众诗歌》，章靳以在上海曾接办茅盾等人办的《小说月刊》，但这些刊物都于1950年停办。在“专业化”的推行者看来，期刊众多造成重复和浪费。如《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关于改进和发展全国出版事业的五项决议》规定：“各种期刊应根据其性质及读者对象，逐步做到专业分工，以清除目前存在着的重复混乱现象。”见宋原放：《中国出版史料》第3卷（上），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01页。

② 黄洛峰1949年前为三联书店的经理，1949年为新中国出版界最高领导机构出版工作委员会委员，主管出版工作。1949年11月任国家出版总署出版局局长。此时，出版工作委员会所领导的国家机构是新华书店，新华书店一身兼有出版、发行等多种功能。这一时期的新华书店，体现着对1949年前商务印书馆等出版模式的延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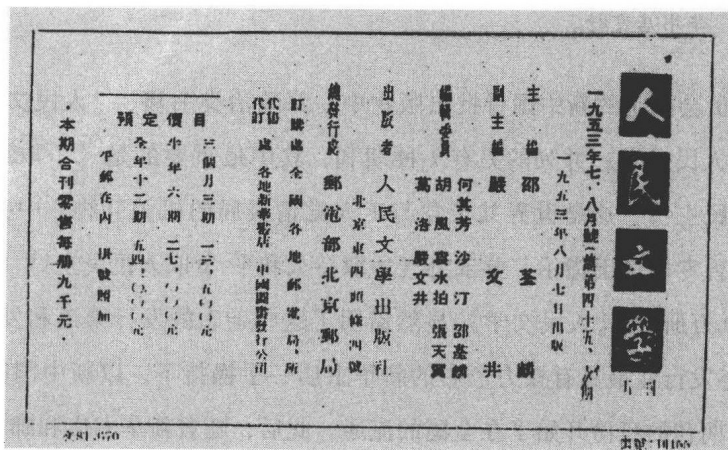
《人民文学》与其他7种刊物，成为新中国第一批期刊，由新华书店发行。

版工作委员会拟定的新中国首批出版物中，除政治类书籍、“人民文艺丛书”外，与《人民文学》并列的另有7种期刊，其中最重要的是《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这是世界共产党与工人党情报局的机关刊物。中共中央对这些杂志曾专门作出指示，要求将《争取持久和平 争取人民民主!》的发行份数达到10万册。<sup>①</sup>《人民文学》显然借用了这些杂志的发行渠道和发行力量，在1949年发行业最具有权力色彩的新华书店一手操持下，以新中国第一家中央级文学期刊的身份开始了在全国的流通。此后，随着新华书店和邮局在全国的一体化网点分布的完成，《人民文学》的发行转入正轨。可以说，在1949年创刊之初，黄洛峰、情报局机关刊物、新华书店，一开始就为《人民文学》获得在全国的影响力建立了制度性保证。

① 其他7种刊物为：《中苏友好》《新华月报》《争取持久和平 争取人民民主!》《新闻半月刊》《新中国妇女》《新音乐》《文艺报》。这是新中国第一批中央级刊物。中共中央对此极为重视，将其出版、发行视为党的任务，如1949年7月11日，特别发出《中共中央关于积极推销共产党情报局刊物的指示》：“中央决定：该刊英俄文版在我国的销行，应争取达到每期1万份，同时并由新华书店总店出版该刊的中文版，其销数应争取达到每期10万份，全党应为此任务而努力。”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第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76页。

### ■ 三位一体的主编们

列宁在规定“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的同时，即补充说：“文学事业……绝对必须保证个人创造性、个人爱好的广大的空间，保证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大的空间。”但是，这种独特性的“空间”，“只证明了无产阶级的党的事业的文学部分不能和无产阶级的党的事业的其他部分死板地等同起来”，并非成为“超党”的文学。<sup>①</sup>在缔造新中国的文学话语、创造无产阶级文化的前提面前，《人民文学》的特殊地位只是其合法性的保证；而新的“人民的文学”的创造，毕竟需要依赖文学自身。因此，选择那些富有声望的文学权威来担任文学机构的领导和《人民文学》的主编，就成了自然的趋向。



《人民文学》1953年7、8月号封三登載的邵荃生任主编时的《人民文学》编委会名单。

但是，这些文学权威实际上是另一种权力形式。他们在文学上的权威，既建立自己的文学成就上，也建立在他们30年代的“左翼”身份以及1949年后他们在文学体制中的官员身份上。《人民文学》历届主编、副主编，莫不具有显赫的双重身份（如表1所示）。

<sup>①</sup> 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列宁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5~8页。



表1

1949~1966年《人民文学》主编、副主编、编委

任职时间	主编	身 份	任职时间	副主编	身 份	任职时间	编 委
1949.10— 1953.6	茅盾 53—56岁	浙江人。上世纪20年代编辑。30年代左联作家、领导。代表五四文学成就的编辑、作家和理论家。时任文化部部长、文联副主席，文协主席等。	1949.10— 1952.2	艾青 39—42岁	浙江人。来自解放区。诗人，人大代表。	1952.3— 1953.6	茅盾 欧阳山 冯雪峰 艾青 何其芳
			1952.3— 1953.6	丁玲 43—44岁	湖南人。来自解放区。时任文协党组书记，文协副主席。	1953.1— 1953.8	艾青 何其芳 周立波 赵树理
1953.7— 1955.11	邵荃麟 44—47岁	浙江人。上世纪20年代复旦大学读书，30年代开始著译。40年代因《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批判胡风而著名。时任作协党组书记。	1953.7— 1955.11	严文井 38—40岁	湖北人。文协秘书长。	1953.7— 1955.11	何其芳 沙汀 邵荃麟 袁水拍 张天翼 葛洛 严文井 胡风（至1955.5）
1955.12— 1957.11	严文井 40—42岁	湖北人。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毕业，鲁艺任教，40年代写过童话。1953年前任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时任作协党组副书记、书记处书记。	1955.12— 1957.11	秦兆阳 39—41岁 (李清泉 俞林)	湖北人。来自解放区，做编辑。时任作协党组成员。	1955.12— 1957.11	何其芳 吴组缃 秦兆阳 张天翼 葛洛 严文井